

新时代文学的新内涵

□石一宁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的讲话,是继文艺工作座谈会、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和党的十九大之后,关于文艺的又一次重要论述,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是我国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文学艺术发展的方向和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新时代也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临着新的挑战的时代。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跟随着时代的步伐,感应着时代的悲欢,因此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新时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还是一个空间概念。习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我理解,这是因为在新时代的空间里,正在发生着历史的巨变,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坚毅奋斗,正在中华大地上谱写壮丽的史诗。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近14亿中国人民的磅礴力量,正在这个空间里淋漓尽致地演绎发挥。当代文学要注视新时代这个时间,更要把握新时代这个空间。

新时代是新的时间和新的空间,对文学来说,这意味着新的历史内容、新的人物、新的情感。习总书记指出,文艺工作者要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要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我理解,这些话实际上指出了新时代文学所应具有的内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及其伟大成就,是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和发展进步,这一伟大创造和发展进步和经历着、体验着这一切的当代中国人的精彩生活,以及其中所喷薄、所涌流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力量,是新时代文学应该关切、凝注和含纳的历史内容。新时代是一个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更加接近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时代,新时代中国人的生活,是走向富强、更加自信、满怀希望的时代,新时代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力量力量的张弛,正是来自这种富强、自信和希望。新的现实、新的生活,既为文学提供了新的主题、新的灵感,也必然涌现新的人物、新的情感。新时代文学工作者面临着更新观念、调整心态去寻找、去发现、去捕捉、去表现新的人物和情感的新课题、新挑战。

新时代的生活必然对文学创作的现实题材提出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繁荣文艺要加强现实题材创作,而在看望政协文艺界社科界委员的这次讲话中,习总书记对此更有针对性地加以强调,明确提出了文艺创作者要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讲话对加强现实题材创作的内涵、外延和意义进行了界定和阐述,值得文学界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深思、领会进而实践、探索。

当前文学创作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一些作家对现实题材创作缺乏重视,缺少自觉性,更缺少紧迫性,有的甚至对表现现实生活完全不感兴趣;二是一些作家虽然从事现实题材创作,但对现实生活的反映缺少热情、态度消极,作品充斥着灰色的生活、灰色的人物和灰色的情感,作品缺乏生气和创新。这其中的一大原因,我觉得是文学观念的问题。一些作家刻意与现实生活保持距离,认为现实题材作品无法成为经典,把表现现实生活等同于图解政策因而而不屑一顾;一些作家则认为只有灰色生活、灰色人物与灰色情感才是真实的人性,灰色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我认为这样的文学观念实际上已经陈旧,已经成为一种刻板僵化的观念。它对现实的变化不是视而不见就是一无所知,它只以一种尺度或者说只以一种陈旧的尺度去衡量生活、衡量人性,它的视角是单一的,眼界是狭窄的,思维是缺少辩证的。这种文学观念没有时代性,也没有历史感,落伍于时代的步履,也无法把握历史的变迁。

现实是历史的前进与发展。新时代的生活、人与情感,脱胎于历史,又与历史相区别。新时代的现实生活,已与历史拉开距离,呈现出新的面貌和新的特征。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理应敏感于这一点。同时,文学既面对历史,也面对现实,文学对历史与现实的表现是辩证统一的。学习习总书记的这次讲话,我想文学界应产生一种共识,即反映现实、观照现实,希望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的文学,也是可以具有精神高度、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的。

培根铸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伟大的精神力量

□范玉刚

2019年3月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在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希望大家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在语重心长的话语交流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呼唤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更需要伟大的精神力量,只有伟大才能让一个民族赢得尊严和自豪,精神的伟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新时代是一个“强起来”的时代,中国之强是一种文明的感召。所谓“强”是一种精神内涵的充实和美的力量的彰显,它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伟大与自豪,是对自身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尊崇和遵循,这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根基。作为民族伟大复兴的表征,文学艺术应该书写的是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传递的是理想信念的温情,凝聚的是人心的共识。艺术的繁荣、文化的高地、民族文化的高位态,深刻影响着国家的文化安全,由此熔铸的民族话语表达与传播能力体现出的持久性文化创新力和普遍性的人类价值诉求,是建构一个国家有效化解意识形态重大风险的文化能力的关键。

时代是界定“伟大”的关键词。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深刻用意必须深刻理解这个时代。时代是我们的现实语境,是我们站稳脚跟的神州大地,是我们仰望的星空。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一个14亿人民投身其中的史诗般改革开放的创造时代,一个处于民族伟大复兴拐点时刻,放眼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变动不居,国际

风云诡谲激荡。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一定意义上说,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作为时代之担当,文艺与时代同频共振就要扎根现实,不仅身入人民的火热生活,更要在情入、心入中提升自己的艺术表现力,在倾听人民的心声中增强审美创造力,使自己的创作与国家的需求和民族的命运紧密关联,在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发出时代的声音。文艺的人心、理论的接地气、文化的培根铸魂,直接关系到国家昌盛和民族复兴的伟业,它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华民族以什么样的形象、姿态和追求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关乎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文脉的接续及其如何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贡献、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和社会转型期的诸多现实挑战,当代文艺要在精品不断涌现中建构新时代的文化经典,要有时代的艺术高峰和大师大作,要有捍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品力作,以伟大的精神力量铸就新时代的人类文明之光。因而,只有包括繁荣文艺在内的文化大发展,文艺精品不断涌现,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才能牢牢掌握思想文化领域国际斗争主动权,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有效化解意识形态重大风险和国家安全。

“人民”是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关键词。人民是革命话语的主题词,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文件和习总书记讲话中的高频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就是要把人民高高举起,社会主义文艺就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作。文艺家要把艺术才干的成长、艺术表现能力的增强深深植根于生活、植根于人民,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哺育自己,从社会生活中汲取营养、挖掘素材、提炼主题,才能在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进行艺术创造,实现艺术进步。文学艺术家和理论工作者不仅要站稳立场,而且要高举社会主义旗帜,以精品奉献人民,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坚定文化自信。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家艺术家,伟大的人民期盼伟大的文艺作品。创作精品要力戒浮躁,扑下身子、潜下心来,增强对艺术的感悟和表现能力,在勇攀时代高峰中建构当代文化经典。在提高洞察社会和适应时代能力中,理论创造一定要立足中国经验、扎根中国实践,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才能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稳定根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明德”是悉心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关

键词。“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礼记·大学》的开篇之句,“君子之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性,推己及人,使人达到完善的道德境界。习近平总书记以“明德”纵论文艺和理论的社会功能,不仅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导向,还有着立足国际视野的战略思考。国之灵魂蕴含着一个民族深沉的力量,文艺激荡着一个民族血性的文化基因,振奋着一个民族委顿的心灵,而昂扬于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豪迈,英雄情结是民族血气的集体无意识展示,发掘和触动这个情节于笔端,就会在天地间铸就新时代的精神图谱。“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在世界文化竞争的舞台上,文化艺术、社会科学为国家培根铸魂。培土植根赓续的是历史的文脉,坚定的是我们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铸魂挺拔的是一个民族的脊梁,成就的是一个国家的伟大,文学家、艺术家和理论家的培根铸魂,不仅兴盛的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还以当代文化经典的建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伟大的精神力量。

文艺创作和理论阐释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好的传播与践行载体,习总书记在讲话中一再强调,当代文艺发展一定要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加强文艺队伍建设,造就一大批德艺双馨名家大师,培育一大批高水平创作人才,激励艺术家更加自觉地“明德”,就是为了更好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培根铸魂旨在使中国的文艺高昂起来,以心中的大义书写社会主义的辉煌和新时代的民族史诗;旨在使中国的理论立起来,在有效阐释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提炼出标识性概念、范畴、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以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和人类文明的阐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在地方和民族的特殊性中诉求普遍性的世界共同价值。习总书记的谆谆话语蕴蓄了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理应以高远志向、良好品德、高尚的情操、高尚的追求为社会作出表率”的殷切期盼,旨在通过甄别类丑善恶醇化社会风气彰显正大光明的品德,为中国的文化、民族的复兴指明了清晰的价值导向。在迈向现代化强国的今天,我们不仅要传承古代君子风尚,更要有现代文明意识的培育和弘扬,在历史的创造中实现文化的进步,以文化人、文德教化,中华民族之伟大必然显现于文化创造、民族精神之昂扬,必然显现于国人的精神风貌,最终落实于人类文明的新贡献,这是新时代赋予文化生产、文艺创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责任担当。



“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与“重述20世纪中国”

□周展安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成为当下文学发展的最强音。“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应以中国人正在展开的实践为主体,记录、书写新时代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回答时代的课题。同时,当下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产物,尤其是20世纪中国的产物,“讲好中国故事”因此就不能局限于记录和书写这几年的巨变,也需要重新讲述中国的历史,特别是重新讲述20世纪中国的历史。在一种长时段、连续性的视野中,把握作为动态的文明体的“中国”。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重述20世纪中国的历史,正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的核心论题。这些年围绕“新清史”、“蒙元史”的辩论溢出历史专业的领域,成为当下思想论辩的热门话题就是表现之一。在“20世纪中国”的论域当中,“新革命史”、“社会主义儒学”等话题也折射出“重述”所带来的张力。这种“重述”的潮流是中国这些年飞速发展伴生的。“重述20世纪中国”,重新讲述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情感,以新的视角讲述中国故事,这种“重述”的潮流是随着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巨大发展而出现的。“中国崛起”的历史图景不仅带来了政治经济上对于“中国道路”的自觉自信,也带来了思想上对“中国道路”的自觉自信。文学向来以对现实变动的敏锐性而著称,理应对当下社会发展和思想论辩的动向做出回应。

从“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中取材,讲述“20世纪中国”的故事,也曾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的重要取向。但是,相比于过去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步潮流的乐观描写,八九十年代文学

对于“20世纪中国”的讲述多以悲情化叙事为主;相比于过去侧重于对集体的描写,八九十年代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的讲述多以个性化叙事为主;相比于过去的宏大叙事,八九十年代文学多以日常生活化叙事为主。去政治、去历史、去现实成为作家们的普遍追求。“20世纪中国”,尤其是“20世纪中国”中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被与“人性”、“人道”、“自由”等概念对立起来,似乎要肯定后者就一定要否定前者。

上述创作特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新时期文学”在面向“20世纪中国”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创作取向有其历史意义,但在今天,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作家们应当在一种更加综合的视野中逐步反思“新时期文学”的话语模式,重新讲述20世纪中国的历史。就此而言,“讲好中国故事”与“反思新时期文学”及“重述20世纪中国”是同步的。

所谓“重述”,是指相对于“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观点,作家们应该以一种更具内在化和现实感的态度来理解和呈现“20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道路、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应该基于20世纪中国人自身的历史逻辑对于“20世纪中国”这一巨大的历史存在或者这一存在当中的某些重要时段、重要事件进行书写与重构。在“重述”中,必然伴随着对于“启蒙”、“救亡”、“革命”、“文明”、“个体”、“人性”、“世界”、“国家”等等概念更具主体性的理解,对于启蒙与革命、文明与野蛮、东方与西方等等二元对立观念的松动与综合。

在对“20世纪中国”的“重述”中来“讲好中

国故事”,特别应注重以下几个主题:

第一,对“20世纪中国的战争和革命”的重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中,战争与革命被做了较为纯化的单面的描写;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战争与革命在“人道”、“人性”等概念底下趋于解构而多呈现出压抑性的特质。在这些时期,传统、启蒙、革命等等处于相互否定的对立关系中。战争与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重大主题,当下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20世纪当中浴血奋战的结果。战争与革命有其残酷性,但严肃与正面的态度应是战争和革命书写的基本态度。

第二,对“中国城乡关系”的重述。在20世纪文学当中,对城市的描写一直是薄弱环节,同时,城市对于乡村又一直扮演着“不在场的对立者”的角色。相比于“现代的”尘世,乡村或者被描写为愚昧的、破败的,或者被抽象化为诗意的园地。城乡关系在文学中常用于对立地位。进入新世纪,客观上具备了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视野中来看待乡土变迁和城乡关系的契机。在长时段的视野中,对20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乡土世界应具有更动态性和内在性的描写,不仅表现出乡土世界的苦难,也表现出这种苦难的变化轨迹。对于城乡关系,也应逐步尝试摆脱对立的思维格套,以“中国”的整体视野来理解城市和乡村的关系。

第三,对“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重述。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中,知识分子常被表现为“受难者”的形象,民众多呈现为愚昧的群像,知识分子和民众常用于启蒙和被启蒙的关系当中。这种关系模式在当下不少作品尤其是影视改编作品中还有表现。新时代文学更强调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基于此,作家应对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自我崇高化进行深刻反思,促使知识分子的形象摆脱理想化和理念化的套路。王蒙的《这边风景》对新疆地区集体化历史的书写,范稳的《水乳大地》和《碧色寨》对滇藏地区历史变迁的书写,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对新中国成立之后西藏地区历史的书写,展现了对“少数民族和边地”的重述;《生死疲劳》对章回体的采用,《上塘书》对地方志形式的采用,《老生》对《山海经》结构的采用,《日夜书》对纪传体的采用,《古炉》对于世情小说手法的采用等等,展现了在“20世纪中国”的重述中向本土化文学形式不同程度的回归倾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所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要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具备历史视野,立足当下实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历史统一起来。对“20世纪中国”这段历史的重述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新时代的文学发展,应在新世纪以来文学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对“20世纪中国”的“重述”,充分展示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战争、革命、建设、改革中所表现的一贯的强制力量和创造精神。同时,对“20世纪中国”的“重述”,只是新时代文学“讲好中国故事”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有对整个中国历史加以“重述”,从而展示出作为伟大文明体的“中国”持久的、生生不息的活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围绕以上主题对“20世纪中国”加以重述的作品已经涌现出不少。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胡学文的《血梅花》等对于战争的描写,王安忆的《启蒙时代》、韩少功的《日夜

书》等对于新中国成立后重要历史时段的描写,都展现了对“20世纪中国的战争和革命”的重述;付秀莹《陌上》对如画的乡村风俗的表现,陶少鸿《百年不孤》对乡绅道德力量的关注,更呈现了20世纪中国乡村的多维画面,王安忆的《考工记》、金宇澄的《繁花》、石一枫的《心灵外史》等从不同角度对城市的描写,都展现了对“中国城乡关系”的重述;在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宗璞的《东藏记》、刘继明的《人境》以及韩少功的新作《修改过程》等作品中,知识分子的形象被放置到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段中,在和真实历史的互动当中,展现了对知识分子形象的新理解;王蒙的《这边风景》对新疆地区集体化历史的书写,范稳的《水乳大地》和《碧色寨》对滇藏地区历史变迁的书写,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对新中国成立之后西藏地区历史的书写,展现了对“少数民族和边地”的重述;《生死疲劳》对章回体的采用,《上塘书》对地方志形式的采用,《老生》对《山海经》结构的采用,《日夜书》对纪传体的采用,《古炉》对于世情小说手法的采用等等,展现了在“20世纪中国”的重述中向本土化文学形式不同程度的回归倾向。